

“代际改善”还是“故事重复”？

——青年流动人口职业地位纵向变动趋势研究

杨菊华

摘要：通过对多期人口普查和小普查数据的综合分析，本文发现：在1982-2005年间，所有人群的职业地位均得到改善，青年人的改善幅度更大；在任何时点，与年长人群相比，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始终较低，未有显著的“代际改善”特征，而传递着一定的“故事重复”信息；然而，2005年的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超过1990、2000年同类人群的职业地位。这表明，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既非显著改善、亦未完全重复，而是较为复杂，或许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截然界分。但是，社会分层的故事却依旧通过制度性和结构性要素而继续传递和再生产。

关键词：乡-城流动人口；青年流动人口；新生代；户籍制度

尽管在1980年代、1990年代和2000年代，都有大量活跃于经济领域且引领流动人口风潮的青年流动人口，但他们大多被淹没在对流动人口总量、特征、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宏观后果等方面的研究之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2000年前后，随着社会对流动人口个体及家庭福利的逐渐重视，这个被冠以“新生代农民工”或“第二代农民工”的群体才开始备受关注。

然而，由于数据之差和研究视角之别，不同研究讲出的故事亦有差异，可归纳为两个假说：

一是“代际改善”假说。特殊的出生和成长背景使他们的流动际遇与父辈明显不同，流动特征具有“四高”、“一低”、“一薄弱”、“一强烈”的特点：教育程

度、职业期望、消费水平、保障程度均较高，但工作耐受力低，乡土观念淡薄，对流入地认同强^{[1][2]}。

二是“故事重复”假说。由于制度和结构性因素的制约，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依旧从事最差、最脏、最苦、最累的工作，续写并传递着既有的社会分层故事^[3]。

毫无疑问，若仅将不同年龄人群进行对比，各自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差别自是难免。然而，这里的问题是，在一个横向时点上，进行新老人群之间的比较是否足够？同时，新老是相对而言的，在各个不同年代都会有“新生代”，今天的“新生代”是否因制度性和结构性制约依旧重复着1980和1990年代“新生代”所面临的困境、存在的困难？还是一如目前“新

生代”概念所界定的那样，新一代拥有更好的经济社会地位？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深入且综合思考四个核心要素：时点特征，年龄队列，制度隔离和结构制约。而现实情况是，综合考虑这四个要素的研究很少，故无论是“代际改善”还是“代际重复”假说，均未得到有效检验，后者更是如此。

本文以职业为切入点，使用多期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检验上述两个假说。具体进行以下探索：一是描述、比较青年流动人口及相关人群职业地位的变动趋势，纵向把握各时期相关人群职业地位的异同；二是综合考虑时期因素、年龄队列、制度隔离和结构制约，借助模型分析，检验前述两个假说；三是探讨制度性和结构性要素、个体特征和地区因素对青年流动人口及相关人群职业地位的作用。

由于“新生代”的定义有特殊所指，本文除在引用其他学者的研究沿用原作者的用法外，使用“青年”一词泛指16-29岁人群。当然，不同研究对“青年”的定义差异甚大。不过，若认同青年期是从依赖成人的少儿期向独立的成人期过渡阶段的话，“青年”时期大约从16岁到29岁。16岁时已初中毕业，逐渐养成独立人格；29岁时基本完成学业，参与社会劳动，并多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承担起家庭和社会双重责任，完成了从少儿期向成人期的过渡。

一、文献梳理

职业是群体身份客观且最易观察的标识。不同职业在劳动强度、工作条件、收入水平、权力拥有、受尊敬程度、为公众服务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差别，进而造成人们对职业地位的不同看法和态度。纵向的职业流动是纵向社会流动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纵向社会流动的主要路径^[4]。

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较低，职业隔离明显。一是声望低，多数从事着粗、重、脏、累、险、苦的工作，在职业阶梯中处于中底层，总体社会地位低下^{[5][6]}。二是隔离强，多集中在建筑业、加工制造业、低端服务业，被限定在特定的经济和社会空间之内。三是稳定性差，工作变动频繁，且经常遭遇失业问题^{[7][8]}。四是社会流动空间狭小，难以成为正规经济部门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或政府机关干部^{[9][10]}。尽管非农流动人口一半以上属于中层白领，职业结构近乎“橄榄型”，农业流动人口的职业分布依旧是底层人口规模较大的“烛台型”^[11]。

流动人口职业地位获得受诸多因素影响。比如，户籍、就业、保障、教育培训等制度性歧视都是制约流动人口职业地位的障碍^[12]。政府部门对流动人口的准入门槛高，限制措施多，使得他们主要进入市场主导部门。虽然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具有正向作用^[13]，但乡-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低，专业技能不高，极大地制约着他们的职业地位获得。

由于成长的时代不同^[14]，新老群体之间无疑存在差异。相比而言，第二代农民工对自己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要求更高，除赚钱外，他们较重视安全、维权等关乎生活质量的因素（如人文环境、文化娱乐、工作氛围等），从而驱动他们希望从事轻松而待遇较好、能够开眼界的职业^[15]。但实际情况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层次依旧低下，并未与第一代农民工呈现出太大差异^{[16][17]}。

那么，青年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究竟是得到改善还是维持不变呢？若代际职业得到改善，哪些因素带来了改善？若代际职业呈现出重复的故事，又是哪些要素维持着社会地位分层的历久不衰？回答这些问题，必须采用具有可比性的多个时点的数据，并需要有合适的参照对象。而在现有研究中，纵向比较改革开放以来青年流动人口职业地位的研究以及比较青年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同辈户籍人口的研究均近乎缺失，从而使现有研究未能直接探讨制度隔离（即户籍制度）和结构制约（即劳动力市场要素）对不同年龄人群的影响，而这也可能提供是故事重复还是代际改善的信息；同时关注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和青年城-城流动人口的研究几乎缺失，故现有研究未能厘清不同户籍身份流动人口的职业状况，也难以区分制度性要素对他们的影响。

二、理论框架

为检验前述两个假说，回答研究问题，必须综合考虑时点特征、年龄队列、制度区隔和结构制约。这四个要素相结合，形成如图1所示的、具有“四维性”特点的理论分析框架。

一是时代性：关注不同时代（青年）流动人口职业地位的模式、特点、动态变化趋势、共性与个性。随着社会的变迁，新兴产业、新型职业类型大量涌现，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是否随之发生变化？这个维度的对比可提供初步的答案，并有助于检验理论假说。

二是朋辈性：关注青年人口与年长人口及同辈群



体的异同。在过去 30 年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青年流动人口是处于弱势地位、还是获得了更好的职业地位？这重比较可检验上述假设。

三是相对性，即关注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异同。参照群体理论认为，个体虽隶属于某个群体，但在他们的心中往往向往另外一个群体，并向之看齐。进入流入地后，流动人口的参照群体很自然地就变成了流入地市民。这重比较可考察不同群体职业地位获得的个性或共性，以及制度性和结构性要素在其间所扮演的角色，回答前面的研究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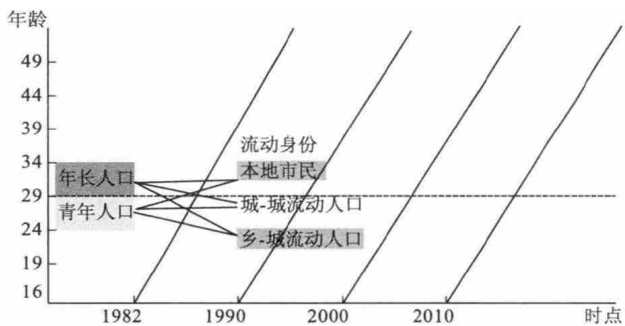


图 1：时点、年龄、流动身份：青年流动人口职业地位的四维性

四是分层性：关注乡 - 城流动人口与城 - 城流动人口的异同。除少数研究外^{[18][19][20]}，多数研究关注农民工，忽略后者。尽管流动人口均属外来人，但他们内部也有分层：依附在城镇户籍上的各项机会、权利和福利使城 - 城流动人口拥有更强的职业发展优势。自出生之日起就被贴上“农民”标签的乡 - 城流动人口却不得不承受这种先天劣势带来的职业之困。因此，将流动人口混为一谈是否会缩小或扩大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之间的职业差别？仅关注农民工是否导致对流动人口职业地位的认识失之偏颇，且难以厘清和准确把握全部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这个维度的对比可解答上述疑惑。

三、数据与方法

1. 数据与样本

本文利用 1982、1990、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和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即“小普查”）数据。前两期数据为普查的 1% 抽样数据；2000 年的为普查的 0.95% 数据，2005 年的为抽样调查的 20% 数据^[21]。这些数据兼具代表性和可比性。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由于数据样本量大、涉及的人群广、样本差异大，故而依旧是至今进行青年流动人口职业地位纵向比较

的最佳数据。

样本选择采用以下标准：一是剔除流入地农业户籍人口。二是仅分析有“职业”之人。三是出于可比性的目的，仅关注年龄介于 16 岁 - 60 岁之人。经过筛选，最后的总样本量为 3245851 人。四期的样本分别为 1452869 人，1244847 人，158213 人，389922 人。

2. 变量界定

本文的因变量为职业地位，测量为职业声望。在界定职业地位时，首先必须解决历次数据的兼容性问题：普查采用的是职业小类，编码介于 0-999 之间；小普查采用的是职业中类，编码介于 0-100 之间。为此，本文将小普查的职业编码 $\times 100$ 。对于中国的职业分类，不少学者进行了探索^[22]。尽管几次普查的职业分类系统有别，但不同时点多数职业都是一样的，且职业类别的原始编码排序具有从高到低编排之义。因此，在参考现有研究、结合我国的国情对部分职业排位重新调整的基础上，对职业类别进行赋分。该变量的最后取值介于 $[0, 990]$ ；取值越大，表示职业地位越高。由于职业声望本身就是主观认识，故对不同职业的赋分、处理可能不尽合适，这也是本文的一个局限。

主要自变量的选择突出“四维性”特点。其一，时点、年龄、流动身份的独立变量。时点即 1982、1990、2000 年普查和 2005 年小普查四个时点，各自被处理为一个虚拟变量，用以考察职业地位的时代性。年龄衡量为两个分类，即其他人群和青年人口，后者定义为 16-29 岁之间，赋值为 1，用以考察职业地位的朋辈性。关于流动身份，基于可得信息，兼顾数据的兼容性，将流动身份分为三类：本地市民、城 - 城流动人口和乡 - 城流动人口，用于群间和流动人口群内的比较，考察职业地位的相对性和分层性、制度性（即户籍制度）和结构性（即本地、外来）因素的影响。由于 1982 年普查数据未提供户籍，故无法区分户籍身份；鉴于当时城镇户籍之人离开本地的现象尚不普遍，流动人口可能多来自农村，故将流动人口当成乡 - 城流动人口。其二，年龄与流动身份的复合变量。基于年龄和流动身份，形成一个复合变量：年长本地市民，青年本地市民，年长城 - 城流动人口，青年城 - 城流动人口，年长乡 - 城流动人口，青年乡 - 城流动人口。其三，时点、年龄与流动身份的复合变量。基于时点、年龄与流动身份，生成一个涵盖 18 个分类的变量：1990 年、2000 年和 2005 年三个时点 \times 六分类的年龄与流动身份的复合变量，

得到此变量；由于不够兼容，该变量不包含 1982 年样本。

为探讨主要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独立关系，模型控制样本的人口学特征、受教育程度及所在地区。对流动人口，本文还控制流动原因和流动跨越的行政区域。

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描述性分析，了解样本本人群职业地位的纵向变动趋势、现状和特点；利用线性回归模型，探讨职业地位的影响因素，尤其是主要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独立作用。由于四期数据均具有聚类特性，个体寓于地区中，地区寓于省（市、区）中，构成套嵌关系。为此，本文采用稳健标准误予以纠偏。

四、描述性分析结果

在全部样本中，职业地位的均值为 472.2 分（满分为 990 分），若不包括 1982 年样本，均值为 489.6 分。可见，即便排除了本地农业户籍人口，人们的总体职业地位仍不高。不过，均值掩盖了各时点职业地位的差异。如图 2 所示，第一，从纵向趋势来看，除本地市民的职业地位在 2005 年略有降低外，其余不管是全部样本还是各次样本，职业地位均呈上升态势；第二，从绝对水平而言，城-城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最高，次为本地市民，乡-城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远低于前两类人群；第三，从起点来看，两类城镇户籍人口的职业地位起点都很高，而乡-城流动人口职业地位的起点很低；第四，从升幅来看，乡-城流动人口职业地位的上升幅度最大，而另外两类人群因起点较高而升幅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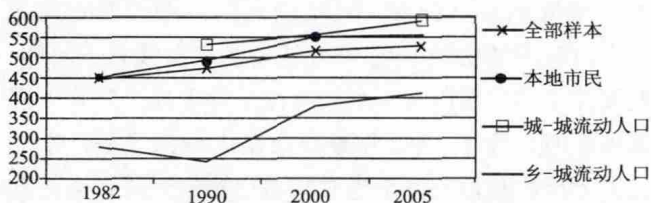


图 2：1982-2005 年全部样本及三类人群职业地位的纵向变动趋势（分）

注释：因 1982 年样本均被处理为乡-城流动人口，故出现 1990 年乡-城流动人口的职业声望得分低于 1982 年同类人群得分的情形（下图同）。

将样本按年龄和流动身份加以细分后发现，图 2 的特点和模式依旧存在，但年长人口和青年人口的职业地位得分存在差异（见图 3）。在 1982 和 1990 年，

本地市民和流动人口中均是年长人口的职业地位高于青年人口，且 1982 年的差距很大，但此后差异逐渐缩小；2000 年青年人与年长者的职业地位大体相当；2005 年发生了逆转，青年人口的职业地位均略高于年长人口，无论哪一类人群都是如此。这一特点可能表明，第一，在 2005 年，“代际改善”假说得到印证，但在其余时点，该假设被证反；与此相对，“故事重复”假说在早期的几个时点被印证，在 2005 年却被证反。第二，时代性较为凸显，2005 年，青年人群的职业地位均超过相应的年长人群，即进入 2000 年后，社会的职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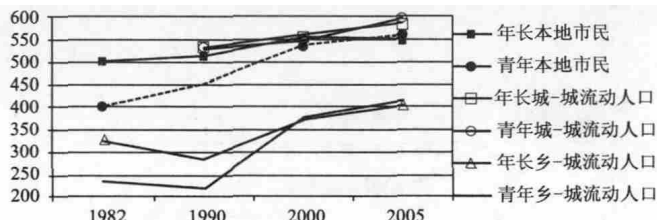


图 3：1982-2005 年六类人群职业地位的纵向变动趋势（分）

此外，我们还分析了在各个时点，全部样本以及按照流动身份区分的次样本等控制变量的基本情况；结果（这里没有展示）表明，所有变量均有足够变异。同时，为了解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是否相关，本文也对所有自变量与因变量进行了交互分析，发现所有自变量与因变量都显著相关，适合于作进一步的模型分析。

五、模型分析结果

下面首先分析全部样本，然后分析流动人口样本；限于篇幅，这里仅展示时点、年龄、流动身份复合变量及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因为它既可直接检验前述两个理论假说，也可同时考察制度隔离和结构制约的作用。

1. 全部样本和全部流动人口样本模型分析结果

模型 1 包括全部样本，模型 2 仅包括流动人口样本。以 2005 年青年乡-城流动人口为参照对象，我们发现，1990 年、2000 年和 2005 年本地年长市民，以及这三个时点的年长和青年城-城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都超过对照组。同样，若其他条件相同，2005 年年长乡-城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也显著超过同期的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尽管模型 2 仅包括流动人口，但复合变量与流动人口的关系同于与全部样本的

关系，唯一的差别在于，不仅 2005 年年长乡 - 城流动人口，而且 2000 年年长乡 - 城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也超过 2005 年的青年乡 - 城流动人口。这样的结果表明，“代际改善”的假说被证反；换言之，在相同时点，即便是年年长乡 - 城流动人口，其职业地位也超过青年乡 - 城流动人口。

那么，2005 年青年乡 - 城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比谁的好呢？在模型 1 中，他们比 1990 年的青年本

地市民好，比 1990 年和 2000 年年长乡 - 城流动人口的好，也比 1990 年和 2000 年的青年乡 - 城流动人口好，说明 2005 年，青年乡 - 城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超过 1990 年和 2000 年同户籍的同龄人群和年年长人口。这表明，从纵向视角分析职业地位的变动特点和模式，描绘出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画面，既有纵向流动的证据，也有社会分层的固化和延续。“代际改善”和“故事重复”的假说均仅得到部分印证。

表 1 :全部样本职业地位 OLS 模型回归分析结果

| | 模型 1 (全部样本) | | | 模型 2 (全部流动人口样本) | | |
|-------------------------|-------------|------|-----|-----------------|------|-----|
| | Coef. | SE | | Coef. | SE | |
| 时点 + 年龄 + 流动身份复合变量 | | | | | | |
| 2005 年青年乡 - 城流动人口 (对照组) | | | | | | |
| 1990 年年长本地市民 | 60.44 | 1.40 | *** | - | - | |
| 2000 年年长本地市民 | 46.34 | 1.63 | *** | - | - | |
| 2005 年年长本地市民 | 26.72 | 1.48 | *** | - | - | |
| 1990 年年长城 - 城流动人口 | 58.97 | 1.89 | *** | 83.95 | 1.76 | *** |
| 2000 年年长城 - 城流动人口 | 41.52 | 2.28 | *** | 72.21 | 2.12 | *** |
| 2005 年年长城 - 城流动人口 | 33.12 | 1.79 | *** | 64.84 | 1.71 | *** |
| 1990 年年长乡 - 城流动人口 | -77.51 | 1.93 | *** | -68.66 | 1.81 | *** |
| 2000 年年长乡 - 城流动人口 | -8.16 | 2.30 | *** | 5.24 | 2.11 | * |
| 2005 年年长乡 - 城流动人口 | 18.87 | 1.69 | *** | 30.33 | 1.57 | *** |
| 1990 年青年本地市民 | -25.39 | 1.42 | *** | - | - | |
| 2000 年青年本地市民 | 1.78 | 2.00 | | - | - | |
| 2005 年青年本地市民 | -1.58 | 1.76 | | - | - | |
| 1990 年青年城 - 城流动人口 | 12.33 | 2.02 | *** | 27.00 | 1.86 | *** |
| 2000 年青年城 - 城流动人口 | 0.42 | 2.94 | | 17.71 | 2.68 | *** |
| 2005 年青年城 - 城流动人口 | 8.10 | 2.31 | *** | 24.09 | 2.16 | *** |
| 1990 年青年乡 - 城流动人口 | -165.10 | 1.63 | *** | -158.20 | 1.50 | *** |
| 2000 年青年乡 - 城流动人口 | -22.37 | 2.49 | *** | -21.06 | 2.24 | *** |
| 控制变量 | | | | | | |
| 女性 | 34.86 | 0.36 | *** | 10.37 | 0.74 | *** |
| 汉族 | -16.77 | 0.80 | *** | 29.86 | 1.50 | *** |
| 在婚 | 11.21 | 0.60 | *** | -44.52 | 1.07 | *** |
| 受教育程度 (<= 小学 = 对照组) | | | | | | |
| 初中 | 74.42 | 0.56 | *** | 58.67 | 0.94 | *** |
| 高中 | 213.02 | 0.59 | *** | 176.34 | 1.20 | *** |
| 大专及以上 | 410.14 | 0.73 | *** | 356.19 | 1.53 | *** |
| 所在地区 (直辖市 = 对照组) | | | | | | |
| 华北 | 25.87 | 0.80 | *** | 5.44 | 1.52 | *** |
| 东北 | -2.36 | 0.77 | ** | -31.10 | 1.60 | ** |
| 华东 | 27.35 | 0.72 | *** | 1.22 | 1.34 | |
| 华中 | 39.23 | 0.81 | *** | 10.43 | 1.61 | *** |
| 华南 | 22.11 | 0.82 | *** | -4.88 | 1.40 | *** |
| 西南 | 40.08 | 0.91 | *** | -1.67 | 1.66 | |
| 西北 | 16.66 | 0.91 | *** | -7.41 | 1.74 | *** |
| 截距 | 290.50 | 1.75 | *** | 335.57 | 2.37 | *** |
| 样本量 | 1792982 | | | 344442 | | |
| R2 | 0.26 | | | 0.36 | | |

注释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显然,在每一个时点,青年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均低于同时点的年长流动人口。1990年,年长乡-城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低于2005年青年乡-城流动人口近80分,而同年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却低于对照组165分;2000年,年长乡-城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低于2005年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约8分,而同年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却低于对照组22分;2005年年长乡-城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也超过对照组近20分。可见,直到2005年,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依旧在重复着1980年代和1990年代同辈群体的故事。

同样,在所有时点,城-城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均超过同一时点的乡-城流动人口,生动地再现了同为外来人,因户籍类型所造成的社会分层。相反,本地市民与城-城流动人口之间的差距很小,尽管在不同时点和不同年龄,并不存在完全一致的模式,而是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特点。这说明,就职业而言,户籍类型的作用大于户籍地点的作用。虽然都是外来人,但城镇户籍及附着其上的后致要素赋予城-城流动人口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大的优势;同为城镇人,本地市民和城-城流动人口之间差别相对较小,即制度隔离的作用大于结构制约的影响。

就控制变量而言,在全部样本中,女性的职业地位超过男性,汉族人口的职业地位不如少数民族人口,在婚人口的职业地位超过未婚者。前两个变量的结果出乎意料,也与多数研究的结论有别;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有待未来探讨。在所有变量中,对因变量影响最大的是教育:教育程度越高,职业地位也越高;若受过大专及以上学历,职业地位超过小学及以下者400多分。由于不包括1982年样本的职业地位均值仅为489.6,400多分的差异充分表明,受教育程度这类人力资本对职业地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地区差异也十分显著:与直辖市相比,东北地区人口的职业地位显著更低,而其他地区人口的职业地位显著更高。可见,尽管直辖市可能拥有比其他地区更高的职业起点,或相对高端的职业比例更高,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职业优势并不明显。

但是,当将样本限定为流动人口时,控制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尽管女性的职业地位依旧超过男性,但民族和婚姻状况与流动人口职业地位的关系与全部样本的恰恰相反:汉族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显著超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而在婚却显

著低于不在婚。虽然受教育程度与流动人口职业地位的关系与全部样本相同,但影响程度却明显有别:对全部样本的影响大于对流动人口的影响,透视出教育对本地市民职业地位的回报率大于对流动人口的回报率。此外,流入地区对流动人口的作用也有异于全部人口:除华北、华东和华中地区外,其余地区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均显著低于进入直辖市的流动人口。

2. 分户籍身份流动人口样本分析结果

若在模型中纳入流动原因和流动跨越的行政区域等流动特征变量,年长乡-城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是否依旧超过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呢?表2中两个平行模型的分析结果回答了这一问题。模型3表明,与2005年青年城-城流动人口相比,1990年和2000年的青年城-城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显著更低,但年长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在各时点均超过对照组。模型4的结果也大同小异,2005年青年乡-城流动人口职业地位显著高于1990和2000年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同时,尽管他们的职业地位也高于1990年年长乡-城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但却显著不如2000年和2005年的年长乡-城流动人口。

流动原因的确与因变量显著相关,但因户籍类型而异:与受经济驱动而流动者相比,因工作原因流动的城-城流动人口职业地位更高,因社会原因而流动者的职业地位更低。但是,对乡-城流动人口而言,因社会原因、工作原因而流动者的职业地位均更低。当然,社会原因涉及多个方面,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非出于职业追求而流动,从而可能拉低了他们的职业地位。同样,流动跨越的行政区域与职业地位的关系也因户籍而有差别:对城-城流动人口而言,与市内流动相比,跨市流动和跨省流动带来更高的职业地位;对乡-城流动人口来说,跨省流动与较低的职业地位相关联。

人口学特征和流入地区对城-城流动人口职业地位的影响模式类似全部样本(即表1中的模型1),对乡-城流动人口的影响类似全部流动人口样本(即表1中的模型2)。这进一步证实,相同的户籍类型使城-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特征更为接近,却与同样作为外来人的乡-城流动人口差距甚远。对乡-城流动人口而言,除华北地区与直辖市之间没有显著差别外,其余地区乡-城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均显著不如进入直辖市的乡-城流动人口。即便影响性质相同的变量,影响程度也差别甚大。比如,性别

对城 - 城流动人口的作用大于对乡 - 城流动人口的作用 ; 无论是哪个层级 , 教育对城 - 城流动人口的作用远大于对乡 - 城流动人口的作用 , 回报率明显有别。

表 2 : 分户籍类型流动人口职业地位 OLS 模型回归分析结果

| | 模型 3 (城 - 城流动人口) | | | 模型 4 (乡 - 城流动人口) | | |
|---------------------------------------|--------------------|------|-------|--------------------|------|-----|
| | Coef. | SE | | Coef. | SE | |
| 主要自变量 | | | | | | |
| 时点 + 年龄 + 流动身份复合变量 | | | | | | |
| 2005 年青年城 - 城 (或乡 - 城) 流动人口 (对照组) | | | | | | |
| 1990 年年长流动人口 | 2.82 | 2.57 | | -73.68 | 1.70 | *** |
| 2000 年年长流动人口 | 40.45 | 3.25 | *** | 11.84 | 2.34 | *** |
| 2005 年年长流动人口 | 23.78 | 2.25 | *** | 23.99 | 1.45 | *** |
| 1990 年青年流动人口 | -36.56 | 2.46 | *** | -127.55 | 1.43 | *** |
| 2000 年青年流动人口 | -1.10 | 3.67 | | -14.48 | 2.24 | *** |
| 控制变量 | | | | | | |
| 女性 | 44.20 | 1.27 | *** | 21.08 | 0.92 | *** |
| 汉族 | -3.88 | 2.94 | 25.16 | 1.68 | *** | |
| 在婚 | 20.70 | 1.99 | *** | -51.53 | 1.23 | *** |
| 受教育程度 (<= 小学 = 对照组) | | | | | | |
| 初中 | | | | | | |
| 高中 | 64.41 | 2.61 | *** | 46.16 | 0.96 | *** |
| 大专及以上 | 202.97 | 2.63 | *** | 124.63 | 1.50 | *** |
| 所在地区 (直辖市 = 对照组) | 369.07 | 2.77 | *** | 279.49 | 4.57 | *** |
| 华北 | 14.47 | 2.39 | *** | 0.96 | 1.99 | |
| 东北 | -11.70 | 2.57 | *** | -33.31 | 2.11 | *** |
| 华东 | 19.35 | 2.18 | *** | -21.27 | 1.72 | *** |
| 华中 | 28.86 | 2.59 | *** | -3.70 | 2.12 | |
| 华南 | 18.02 | 2.31 | *** | -37.07 | 1.76 | *** |
| 西南 | 25.93 | 2.90 | *** | -20.64 | 2.09 | *** |
| 西北 | 8.70 | 2.82 | ** | -24.15 | 2.20 | *** |
| 流动原因 (经济原因 = 对照组) | | | | | | |
| 工作原因 | 52.33 | 1.92 | *** | -26.91 | 3.19 | *** |
| 社会原因 | -11.80 | 1.66 | *** | -138.17 | 1.01 | *** |
| 流动区域 (市内流动 = 对照组) | | | | | | |
| 跨市流动 | 24.86 | 1.57 | *** | 14.84 | 1.22 | *** |
| 跨省流动 | 19.05 | 1.83 | *** | -11.61 | 1.21 | *** |
| 截距 | 293.71 | 4.71 | *** | 412.57 | 2.83 | *** |
| 样本量 | 133573 | | | 210869 | | |
| R2 | 0.27 | | | 0.28 | | |

注释 :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这些模式表明，若将全部流动人口混为一谈，或仅关注“农民工”，得到的有关流动人口的结论可能是有偏的：可能忽视城 - 城流动人口在职业地位方面的相对优势，缩小乡 - 城流动人口与其他人群之间的差距。

六、总结与讨论

本文利用多次普查和小普查数据，采用四维性的理论分析框架，纵向考查了本地市民、城 - 城流动人口、乡 - 城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变动趋势及影响要素，主要结论总结如下。

其一，在 1982 - 2005 年间，各类人群的职业地位都得到明显改善，时代性十分突出，也表明所有人群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受益。在本文关注的各类人群中，乡 - 城流动人口、尤其是青年乡 - 城流动人口职业地位的改善速度最快、提升幅度最大，而城 - 城流动人口和年长本地市民的改善速度最慢、幅度最小。但是，青年乡 - 城流动人口职业地位的大幅度、跨越式的改善是相对于其低起点而言的。

与 1982、1990 和 2000 年的青年人口相比，2005 年青年人口的职业地位更高，本地市民、城 - 城流动人口和乡 - 城流动人口都是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映射出社会宏观环境的变化对职业结构的影响：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职业随之产生，尤其是比产业工人地位稍高的商业服务类的职业大量涌现，吸引了大量的（青年）流动人口；另一方面，一些地位较低的职业逐渐消失，或工作条件和工作内容发生调整。具有一定技术性、地位较高的职业增多，从而带来人们职业地位的改善。因此，尽管发现 2005 年青年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超过 1990 年和 2000 年的同辈群体，但更大的可能性是，这种改善是时代造成的，而非年龄本身所致。

其二，到 2005 年为止的数据表明，无论是“代际改善”假说、还是“故事重复”假说，均仅得到部分印证或证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几乎在每一个时点上，年长人口的职业地位都超过青年人口，青年乡 - 城流动人口也是如此，表明职业地位较低是青年人的共性，凸显出朋辈特性。这一发现显然与当下流行的看法有悖：“新生代农民工”并不比年长“农民工”获得了更好的职业地位，故“代际改善”假说被证反。这也表明，这个人群所谓的“新”，只是因时而异，并没有“新”在职业地位上。

类似地，“故事重复”假说亦未完全通过检验。一方面，在所有时点，年长乡 - 城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超过年轻人，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故事重复；但另一方面，2005 年青年乡 - 城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显著超过 1990 年和 2000 年同类人群的职业地位得分。这样的分析结果表明，与青年乡 - 城流动人口职业地位有关的故事十分复杂，很难用“重复”或“改善”这样的绝对模式加以概括。事实上，两个假说都杂糅了时期、队列两个层次的“新生代”与“老生代”的比较，即当下青年与当下年长者的青年时期的比较，以及不同时点青年与年长人口的比较。因此，一种假说不能得到完全证实或证反是可以理解的；未来的研究需要对此进行更为细致的区分和考察。

其三，就相对性和分层性而言，人群之间的职业地位也差异较大，职业隔离现象明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本地市民相比，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显著偏低。但是，若将流动人口按户籍区分就会发现，职业地位的分层性主要表现为户籍类型之别：1990 - 2005 年间，城 - 城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超过本地市民，但二者差距很小，说明仅仅因本地人和外来人身份造成的差别较小；相反，他们与乡 - 城流动人口之间的差距很大。可见，流入地社会的高门槛主要是针对乡 - 城流动人口的，更确切地说是流动人口所拥有的人力资本使然。数据表明，2005 年，近 40% 的城 - 城流动人口受过大专及以上学历，高于本地市民近 10 个百分点，高于乡 - 城流动人口近 37 个百分点。相反，乡 - 城流动人口由于先天局限（农村户籍）和后天自致要素的制约（如较低的除教育程度以外的人力资本、过于同质性的社会资本、严重不足的专业技能等——尽管这些要素未能得到检验），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明显的弱势。而且，青年人在劳动技能和经验积累方面弱势更为明显，故而无论怎样建模，他们的职业地位都是最低的，青年人、农村人、外来人的联合弱势在他们身上展现无遗。

人群之间职业地位的显著差别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与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其他经济社会制度有关，也与流入地的经济结构有关，当然，这一切都要置于社会转型与变迁这一宏大背景中考察。中国的人口流动、城镇化、市场化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公共福利的不断改善，所有人群都受益于改革发展成果；由于青年

（下转第 77 页）

(上接第 60 页)

乡 - 城流动人口职业地位的起点低, 故其上升、改善的幅度相应最大。但是, 社会发展产出的一些潜在的积极后果可能被户籍制度以及附着于其上的结构和体制障碍所淡化或抵销, 同时, 由于青年乡 - 城流动人口自身在工作经验、劳动技能等流动后人力资本方面的短缺, 故仅仅依靠市场的调节功能, 而没有全程性和全局性的制度改革以及青年乡 - 城流动人口自身人力资本的不断提升, 就难以有效实现纵向社会

流动, 重复的故事还将继续上演。

[本研究是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项目号:13JZD024)的阶段性成果]

杨菊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汪永涛

参考文献:

- [1][3][16] 杨菊华. 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认识误区[J]. 人口研究, 2010(2):44-54.
- [2][17] 张建武, 李楠, 赵勋. 流动人口变动对广东出生人口数量影响研究[J]. 南方人口, 2011(6):56-62.
- [4] 李培林, 李强, 孙立平等. 中国社会分层[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 [5] 高文书. 进城农民工就业状况及收入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石家庄、沈阳、无锡和东莞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 2006(1):28-34, 80.
- [6] 李路路. 制度转型与阶层化机制的变迁—从“间接再生产”到“间接与直接再生产”并存[J]. 社会学研究, 2003(5):42-51.
- [7] 李春玲. 流动人口地位获得的非制度途径—流动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之比较[J]. 社会学研究, 2006(5):85-106.
- [8] 李强. 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 [9] 李春玲. 城乡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4):5-11.
- [10] 王春光. 我国城市就业制度对进城农村流动人口生存和发展的影响[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5):5-15.
- [11] 张翼, 侯慧丽. 中国各阶层人口的数量及阶层结构[J]. 中国人口科学, 2004(6):53-59.
- [12] 宋洪远, 黄华波, 刘光明. 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问题分析[J]. 管理世界, 2002(5):55-153.
- [13] 李培林, 田丰. 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J]. 社会, 2012(5):1-24.
- [14] 史柏年. 城市边缘人:进城农民工家庭及其子女问题研究[J].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15] 刘传江, 程建林. 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J]. 人口研究, 2008(5):48-57.
- [18] 张展新. 从城乡分割到区域分割—城市外来人口研究新视角[J]. 人口研究, 2007(6):16-24.
- [19] 张展新, 高文书, 侯慧丽. 城乡分割、区域分割与城市外来人口社会保障缺失—来自上海等五城市的证据[J]. 中国人口科学, 2007(6):33-41.
- [20] 朱宝树. 城市外来人口的差别特征及相关政策启示—以上海市为例[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1):48-53.
- [21] 遗憾的是, 由于不可得, 本文未能使用 2010 年的普查数据。
- [22] 李春玲. 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J]. 社会学研究, 2005(2):75-102.